

人本主义、国家秩序与经济增长

——试论孔子、孟子、荀子经济思想中的“人本经济学”研究范式

张波*

摘要: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支撑,人本经济学在中国的构建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为了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的理论创新,本文拟从儒家传统经济思想中寻找新的思路,因而对照现代经济学体系,对儒家早期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的经济思想进行了重新梳理,认为儒家为了解决经济学上的稀缺问题,采用了与现代经济学不同的人本主义路径,并由此产生了以国家为研究中心的人本经济学体系,其理论核心是颇具自由主义风范的“国退民进”思想。儒家特有的研究范式启示我们,一种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秩序观的形成是构建中国人本经济学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以人为本 秩序 国家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与“以人为本”的有机结合,是经济学界不可避免的重大理论问题。近些年来涌现出的人本经济学研究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笔者认为,构建中国自己的人本经济学,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创新,同时也是一项前无古人的艰巨工程,为了实现这一伟大创新,我们不仅要借鉴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也应该从同样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汲取营养。事实上,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一向高度关注人的发展,同时也深知“仁”的实现是离不开现实物质条件支撑的,因而系统地研究了人与物的发展关系问题。儒家经济思想和现代经济学相比之所以总是显得“零散”和“不成熟”,恰恰就是由于使用了一种与其截然不同的独特的“人本主义”的经济学研究范式。该范式早在儒家学说的早期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那里就已初步发展成型,因此,本文拟透过他们的思想,对照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去呈现一个风格迥异的经济图景,以期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提供更多的启示和借鉴。

一、人本主义:解决“稀缺”的又一途径

如何解决无限欲望与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不仅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也同样是儒家人本经济学的发端之处。儒家早在孔子时代就意识到欲望存在的合理性,正所谓“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而第一次将欲望与稀缺联系在一起的是荀子,他将各种欲望视为人的本能,“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荀子·性恶》),并由此在《富国》篇中以一种与现代经济学十分相似的思路提出了“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的命题,这正是我们所熟知的“稀缺”。

如何解决稀缺问题呢?众所周知,现代经济学选择了发展物质生产的方式,以期通过最大限度地开发资源潜力来不断适应欲望的要求,尽管现代经济学发展已逾数百年,其“物本主义”的本色却从未改变过。有趣的是,现代经济学如此符合常理的做法在儒家看来却是不可行的,后者认为单纯追逐物质财富不仅不能解决稀缺问题,反而还会带来灾祸。如孔子所言,“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孟子也说,“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荀子进一步意识到逐利的个人在不存在任何约束的情况下,都是“事业所恶也,功利所好也”,其结果必然是“人有树事之患,而有争功之祸矣”(《荀子·富国》),所以认为“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在这里,荀子屡次提到的“争”是一个十分值得我们关注的字眼,它揭示了一种显而易见却又被长期忽视的重要事实——“自利”的人在面对稀缺时,不会首选劳动去主动地创造财富,而是会千方百计地从他

* 张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36,电子信箱:zhmax2008@163.com。

人手中争夺财富,一个争夺肆虐的世界里,再富庶的物质财富也会被消耗殆尽。因此,人类为了克服稀缺,并非一味地发展物质生产那样简单,经济学在研究生产问题之前,首先必须考虑应该如何避免人与人的争斗。

事实上,现代经济学之所以会直入主题地研究物质生产,并不是忽视了“争夺”的问题,而是已经通过一种秩序消除了争夺的可能性,这就是市场。正如哈耶克所言,斯密实现了“一种能够把坏人造成的损害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制度”。在市场秩序下,人们不劳而获而相互争夺的机会被完全剥夺了,他们除了通过劳动和他人进行交换以获取财富之外别无选择。哈耶克本人虽未提及争夺问题,但他的研究已从侧面向世人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道理:秩序对于经济活动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秩序只会使人陷入无休止的利益冲突之中。荀子就是意识到了这种冲突,并由此和斯密一样需要求助于一种秩序来杜绝争夺的发生。不过,他找到的并不是市场秩序,而是基于传统儒家文化的“礼”,他这样说道:“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应该说,儒家正是由于采用了与市场秩序不同的礼制,才使其经济学说呈现出与现代经济学大相径庭的另类风貌。

在儒家学说中,“礼”是与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孔子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礼的本质在于仁,正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人而不仁,知礼何?”(《论语·八佾》)因此,荀子既然选择了礼制,也就继承了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人本主义精神。这种人本主义从两个方面避免了人与人的争斗:第一,它使人从狭隘的物质利益中摆脱出来以追求更高层次的发展,即道德的提升,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人去夺利的主观动机。不同于我们熟知的“仓廩实而知礼节”的古训,儒家不主张人的发展必须有物质基础的保障,而十分强调人发展的独立性。孔子言,“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一个人不管自己拥有多少财富,都应该通过修身去达到“仁”的境界,正所谓“君子固穷”(《论语·卫灵公》),真正注重自身发展的人是不会在物质利益上斤斤计较的。第二,它通过“义利”合一的方式使人们的逐利行为与人自身的发展统一起来,没有给“利”任何独立发展的空间。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只要逐利行为受到“义”的制约,即礼的约束,就可以做到“欲利而不为所非”(《荀子·不苟》),从而保持一种有序的格局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荀子·礼论》)。就这样,荀子借助儒家旨在发展人的规则来约束逐利行为,从而找到了另外一种避免争斗的方法,也由此走上了一条与现代经济学截然不同的人本经济学之路。

二、国家:人本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既定秩序的存在是经济学研究的前提。现代经济学之所以紧紧围绕市场进行研究,是因为已经事先承认了市场秩序的存在,而儒家采用了与之大相径庭的礼制,还会继续以市场为研究重点吗?如果不是,人本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又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有必要弄清楚荀子的礼制与市场秩序相比究竟具有哪些特点。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等级制。市场秩序的基础是独立平等的理性个体,强调个人权利和义务的平等,而荀子恰恰反对这种绝对的平等,他屡次说道,“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一,众齐则不使”,“执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荀子·王制》),“执同而知异,行私而无祸,纵欲而不穷,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如是则老弱有失养之忧,而壮者有分争之祸矣”(《荀子·富国》)。“礼”的基础是等级差异,正所谓“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礼记·哀公问》)。“礼”不强调权利,只强调义务,即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不同地位的人各尽所能,各尽其职。

第二,人治。我们知道,市场秩序与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密切相关的。但是由于“礼”的基础是“仁义”,情感是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因而并不接受独立于人的情感之外而又具有强制力的法律约束,个体的主观行为对秩序的影响很大。荀子反对将物竞天择之类的自然法则应用于人类社会,极力主张“人治”,正所谓“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荀子·天论》)。当然他所指的“人治”也并非个人的随心所欲,而是遵循“礼”的原则,如其所言:“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荀子·天论》)。

第三,控制。市场秩序力图使社会保持均匀分布的原子化状态,人具有自我行动的独立意志。而“礼”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文版,1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尽管荀子的“礼”与孔孟的学说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从坚持人本主义而言仍然是一致的。

严格来说,只有儒家的人本经济学才是真正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学,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人本经济学只以解决个人财富的多寡为研究内容,并不能涉及人的全面发展。

却是存在上下等级的金字塔结构,个人主义没有存在的空间,不同等级之间处于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状态。荀子言,“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荀子·仲尼》)。除了人与人之间存在相互控制外,“礼”的等级结构本身也需要强制力来维持,荀子否认只要做到“仁”就可以自动实现等级,正所谓“不威不强不足以禁暴胜悍”,只有“赏行罚威”,才能使“贤者可得进也,不肖者可得退也”(《荀子·富国》)。

荀子秩序观中的三个特征——等级、人治和控制,使我们可以很清晰地感觉到一个重要角色的存在,这就是国家,荀子直言,“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纵欲”(《荀子·富国》)。由此可见,国家是礼制的具体体现,礼制的实现离不开国家,犹如市场秩序的实现离不开完全竞争市场一样。这就不难推论,既然市场秩序的存在使现代经济学将市场作为理论研究的核心,那么礼制的确立也必然会使儒家建立以国家为核心的经济学说。为此,儒家所有的经济研究都要围绕国家进行,国家成为了儒家人本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儒家经济思想总是体现着一种十分鲜明的国家意志,而我们又为何总是很难从中找到有关供求关系和价格机制等现代经济学关心的内容。儒家经济思想更多地关注国家层面的经济问题,所以才被古人冠之以“经世济用”之学,现代经济学以自己的标准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视为“零散”和“不成熟”其实是一种学术偏见。

国家秩序的建立,意味着儒家同样成功地排除了人与人争夺的可能性,从而可以放心地进入下一个问题的研究,也就是现代经济学一直关注的如何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以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我们知道,现代经济学通过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系统研究了在市场环境下如何实现产出的最大化,那么人本经济学存在类似的理论来解析国家秩序下的经济增长吗?答案是肯定的。下面,我们就对照现代经济学构建市场理论的研究思路,逐步地从孔子、孟子、荀子包罗万象的思想中提炼出人本经济学特有的理论核心。

三、国退民进:人本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众所周知,生产的两大要素是劳动和资源,在资源一定的情况下,产出的多少取决于劳动的投入量和生产率。因此为了实现产出的最大化,就必须最大限度地调动劳动,增加劳动供给。而一个人究竟愿意付出多少劳动,不仅取决于自身的意愿,还需要一定的制度设计来进行激励。哈耶克认为,现代经济学“所主要关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才能发现一套激励制度”,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他还盛赞了市场机制的分散决策和信息优势对于激发人们劳动、提高经济效率的积极作用。我们知道,市场机制的核心就是价格机制,但令人奇怪的是,儒家却一贯反对由供求决定的价格学说,孔子曾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态度,“夫君子岂多而贱之,少而贵之哉!”(《荀子·法行》)孟子也认为“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难道真的是时代的局限性让先哲们没有办法领会到价格机制的神奇之处吗?这样的理由恐怕很难让人完全信服,因为与儒家同时代的诸子百家中,也不乏供求价格论的支持者,如《孟子·滕文公》篇中曾批判的许行就是一位典型的价格论者:“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屨大小同,则贾相若。但是孟子对此的评价却是“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恶能治国家?由此可见,儒家不是忽视了价格机制的存在,而是压根就不愿意接受价格机制,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们知道,价格机制是用于专门研究商品交换关系的,而马克思早已深刻地指出商品交换的背后反映的实质上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将这种关系定义为私有财产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在以“义”为核心的礼制秩序中是没有存在空间的。在礼制秩序下,人与人之间形成的是以“义”为纽带的伦理关系,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在这种人际关系中,物由谁所有和支配取决于“礼制”下的控制人与被控制人的主观意志,所以很难确定物权关系究竟是私有产权性质的,还是公有产权性质的。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下》篇中曾打了一个比方,恰如其分地揭示了礼制秩序中这种“特有”的产权状态,他将为政者治国比作拥有一座园林,园林归其所有,但是里面的财富却是“与民同之”。当政者对整个园林拥有所有权和支配权,但是他又并不必要、也不可能完全占有和使用,当政者可以在任何必要的时候支配一切,也可以在不必要的时候“一无所有”,而民众在平时可以将园

虽然市场秩序也需要强制力来维持,但那是基于一种法律意义上的强制,而这里的强制力是属于人自身的一种特权和权力,不依赖于作为第三方的法律,是一种人对人的直接控制。

任何一种秩序都仅代表一种理想状态,国家秩序和完全竞争市场一样,只是为经济研究提供一个参照系去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犹如完全竞争市场并不代表现实的市场,儒家的国家也并不代表现实的行政官僚组织,所以没有必要因为它与现实不符就质疑和否定国家秩序解决争夺问题的能力。

资本只是劳动的变体,是劳动成果中未被消费掉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部分,所以这里没有必要单独提及资本。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文版,1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林的某个部分作为私产去占有和使用,但又随时存在被剥夺权利的可能性。长期以来,这种令人熟知的状态一直被现代经济学冠以“产权破缺”,但实际上,这恰恰是中国特有秩序观的必然产物。

答案已很明显,正是因为礼制下无法形成明晰的私有财产关系,儒家才没有接受市场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对经济增长的问题就无计可施。在哈耶克看来,如果失去了个人主义的自由经济秩序,也就丧失了最有效率的促进生产发展的机制,但儒家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在哈耶克认为最无效率的国家领域内寻找了一条同样可以最大限度调动劳动积极性的方式,这就是“国退民进”的思想。如果说现代经济学依靠的是价格机制来解决生产问题,人本经济学借助的就是“国退民进”,它构成了人本经济学的理论核心。

那么究竟什么是“国退民进”呢?这是对儒家调动民力有关经济思想的一个概括。用荀子的话说就是:“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荀子·富国》)。所谓“国退”,意指国家要最大限度地从物质利益领域退出,做到“国不敛财”。“国退”是调动民力的前提条件,因为儒家的创始人很清楚,尽管国家从理论上应该是礼制的外在表现,但是现实的国家并非一定能够达到这样的理想状态,国家一旦脱离它应有的本质而成为敛财工具,就会首先成为争权逐利的主战场,所谓“为民父母,行政,不免率兽而食人”(《孟子·梁惠王上》)。国家敛财只会加剧对民众的剥夺,使得有劳动能力的人也就此失去劳动的机会,结果必然导致民力不足,从而给生产带来极大的破坏,所以荀子才说“上好利则国贫”(《荀子·富国》)。而“民进”之意,即指在国家提供了良好秩序的前提下,给予劳动者充分的劳动自主权,同时创造各种条件让劳动者以最大的劳动意愿去创造财富,使其富裕起来。不难理解,在国家秩序最大限度地消除了争夺的可能性之后,如果劳动者又能独立支配自己的劳动果实,任何一个想致富的人都会以最高的积极性从事生产。如果现代经济学利用价格机制来调动劳动,那么儒家依靠的就是“藏富于民”。

粗看起来,“国退民进”似乎只是一种主观意愿很强的美好幻想,但是不要忘记,任何经济学理论都需要通过一个理想模型来确立自己的参照系。在人本经济学中,“国退民进”的思想扮演着现代经济学中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一样的角色,如果说前者是一种空想,那么后者何尝不同样也是子虚乌有之物?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在此计较它是否真的和现实一致,就像我们同样没有理由质疑价格机制是否与现实相符一样。当现实的市场不具备价格机制所需要的完全竞争、充分信息等假定条件时,我们并没有因此就认为价格机制是一种空想,相反只会千方百计地去完善现实的市场,以便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同样的道理,当“国退民进”的思想与现实不符时,我们要做的也不是怀疑理论本身,而应该是不断完善现有的国家体制,使其尽可能地接近理想的国家秩序,从而使这种思想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所以,只要“国退民进”在理论上可以自圆其说,我们就应当承认它的合理性。但是按照现代经济学的思维,这个理论本身似乎还存在着一个疑点:既然“国退”已经要求国家不能向民间敛财,意味着财富的多少已经与己无关,它又怎么会“无私”地去帮助劳动者创造财富呢?难道是因为国家的统治者们的道德如此之高,甘愿为民服务吗?事实上,这里没有丝毫的幻想的成分,一切的奥秘就在上文提到的产权问题上。在礼制秩序下,物权关系隶属于人际关系,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尽可以放心地将所有的物权交付于民,只要维持礼制主导的人际关系不变,就可以通过人际纽带获取对物的最终支配权。恰如孔子之言,“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在国家秩序中,民富与国富相一致并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人本经济学的“国退”和“民进”思想在理论上是自洽的。

既然人本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本身已无懈可击,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将其与现实接轨。我们知道,为了使价格机制能够发挥它的作用,现代经济学对现实的市场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西方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华盛顿共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而儒家为了实现“国退民进”,也同样相应地对国家提出了诸多要求。首先,从如何实现“国退”来说,儒家提出了三项现实性的政策建议:第一,要求国家注重政治建设和文化教育,以尽可能达到礼制的规范。这是构建理想国家秩序最根本也是最直接的方式。儒家思想对此的有关论述可以说浩如烟海,尤其是孟子的“仁政”思想、荀子的“礼制”思想,已经形成了这些方面的系统学说,此处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引证。第二,为了更好的贯彻礼制,儒家还要求国家提倡节俭。孔子曰:“礼者,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孟子由此主张国家要“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以及“食之以时,用之以礼”(《孟子·滕文公上》),荀子也提出了“节用以礼”的等级消费观。第三就是轻徭薄赋,该观点我们已

严格而言,“国退民进”只是一种思想而称不上理论,这也是它与现代经济学相比显得“不成熟”的原因之一。

需要强调的是,儒家的“节用”不是带有禁欲性质的节俭。荀子在《富国》篇中明确反对墨家的节俭论,“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认为“不足欲则赏不行”,“赏不行,则贤者不得而进也”,“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儒家不排斥对物的追求,而是要将物质利益增长与人的发展一致起来。只要人能不断提升自我,纵使富有天下也不为过,正所谓“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上》)。

经十分熟悉,在此也不再引证。需要说明的是,儒家主张轻徭薄赋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实现国家最小程度地染指生产,丝毫没有考虑它对生产会产生什么影响。无论税率的高低对生产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儒家都会一如既往地坚持低税率。人本经济学并不专门研究税赋对生产的影响,这是与现代经济学财政理论的重大区别。

“民进”又该如何实现呢?孔子的观点是“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如果说“国退”是让国家放弃对物质财富的直接占有,那么“使民以时”还要求国家要尽量减少对人的控制。这是因为,国家拥有直接控制他人的权力,如果这种权力被滥用,将会使劳动者无法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也不可能获取属于自己的劳动果实,其结果必然会打击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影响生产的增长。孟子的观点更加具体和全面,他不仅提出了“恒产者有恒心”的著名言论,认为应该充分尊重和保护劳动者的财产;而且第一次从土地制度入手探索富民的道路,他的“井田制”方案足足影响了后世中国土地政策数十个世纪。更可贵的是,孟子还注意到民众生产存在盲目性的问题,第一次提出国家应承担一定的组织管理职能,做到“不违农时”、“数罟不入跨池”、“斤斧以时入山林”(《孟子·梁惠王上》)。这一思想在荀子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黿鼉、鱼、鳖、鳅鲋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可以看出,“民进”思想中涉及的具体内容(财产权、土地制度和政府管制)其实与现代经济学涉及的研究领域颇为相似。

四、总结与启示

至此,本文初步勾画出了儒家带有鲜明人本主义色彩的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全貌,尽管孔子、孟子、荀子三人的思想并不能涵盖儒家人本经济学的全部内容,但是已经足够帮助我们掌握一种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研究思路。为了更清晰地展现这种思路,笔者将其与现代经济学作一个系统的对比(如表1所示)。

表 1	人本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对照表	
	现代经济学	人本经济学
解决稀缺问题的方式	发展物	发展人
解决争夺的方式	市场秩序	国家秩序
解决生产的方式	价格机制	国退民进
政策主张	保护私有制	维持礼制(注重政治)
	提倡理性与自由	提倡节俭
	法治环境	道德教育

由此可见,经济学的研究并不限于西方一种模式,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也并非无章可循。笔者此处无意评判二者的优劣,只期望通过两相比较,将经济学研究中某些隐匿颇深的必要环节挖掘出来,以便为当代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提供诸多有益的启示:

第一,经济学的核心议题固然是生产,但不要忘记在生产之前更需要一定的秩序来避免争斗。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逐步传入中国并大行其道,大多数的经济理论工作者都将注意力放在了诸如生产和效率的问题上。然而本文的研究表明,忽视秩序而单纯强调生产并非一件好事。特别对于正处在体制转轨时期的中国而言,新的秩序尚未形成,旧的秩序又遭破坏,争夺问题往往要比生产问题更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按照现代经济学的效率准则去研究现实问题,有时会纵容争夺,加剧秩序的混乱,进而导致“争则乱,乱则穷”局面的发生。因此,在经济转轨时期,稳定和有序才是压倒一切的大局,我们在经济研究过程中不能一味地追求效率,而应该更多地关注秩序,多从秩序的角度去看待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各种问题。

第二,人本经济学的构建需要突破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束缚。过去我们一直坚信“仓廩实而知礼节”的逻辑,认为现代经济学尽管从其理论本身而言,是排斥人的存在、以物的发展为核心,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种希望:总有一天物质的极大丰裕可以最终实现人的发展。而儒家人本经济学告诉我们,这并不是实现目标的唯一途径,人的发展并非一定要永远追随在物质发展的后面。只要摆脱既定研究范式的束缚,完全有可能将“以人为本”植入经济研究的理论框架,建立一种真正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学说,实现物与人的同步和

税率也不是越低越好,孟子明确反对过过低的税赋,认为这将使国家失去物质根基,儒家主张国不扰民,但也不允许以此否定国家的存在。见《孟子·告子》中白圭与孟子的相关对话。

再次强调,保护私有财产不等于确立私有财产关系,即这种私有财产只反映人与物的关系,而不像现代经济学的私有产权那样还反映人与人的关系。

人本经济学中还有一种重要的干预思想,由于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发展成型,所以未作专门的论述。

谐发展。

第三,构建中国特色的人本经济学,首先需要找到一种以人的发展为核心内容的秩序。本文的研究表明,经济学研究之核心问题——稀缺的解决首先依赖于一种秩序来避免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其次才是在这种秩序约束下最大限度的发展生产。由此推知:秩序各异,则生产理论也不尽相同。因此,要构建真正意义的人本经济学,首先并不急于研究生产,而是应该探求一种适合人的全面发展的秩序。本文虽然重点剖析了儒家的礼制,但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人本主义秩序观,因为中国千年历史的兴衰已经将它的弊端暴露无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既不唯西,也不尚古,而是在扬弃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寻找和培育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型秩序。可喜的是,今日之中国所要走的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实际上正是在构建一种既不同于古代,也有别于西方的新型秩序。因而,经济学工作者只有全面把握中国社会特有的发展规律,深刻领悟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方能充分施展理论创新之本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构建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2 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文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3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文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 4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文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5 刘岸挺:《“隆礼尊贤而王”——荀子礼治论》,载《孔子研究》,2008(2)。
- 6 苗润田:《“放于利而行多怨”——儒家义利学说再探讨》,载《中国哲学》,2007(4)。
- 7 王廷洽:《论荀子的国家观》,载《中国史研究》,1999(2)。
- 8 巫宝三 主编:《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先秦部分上、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 9 许珍琼:《论中国儒家思想中人的发展观》,载《学术论坛》,2004(10)。

(责任编辑:孙永平、陈永清)

(上接第 82 页)

- 20 Coelli, T J., 1996 "A Guide to FRONTIER Version 4.1: A Computer Program for 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and Cost Function Estimation" CEPA Working Papers, 07/96
- 21 Demsetz, H. and Lehn, K., 1985 "The Structure of Corporate Ownership: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3, pp. 1155 - 1177.
- 22 Demsetz, H., 1983 "The Structure of Ownership and the Theory of Firm."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6, pp. 375 - 390.
- 23 Boehmer, E., 2000 "Business Groups, Bank Control, and Large Shareholders: An Analysis of German Takeovers"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Vol 9, pp. 117 - 148.
- 24 Farrell, M. J., 1957. "The Measurement of Productive Efficiency." Journal of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Vol 120, pp. 253 - 281.
- 25 Fuerst, O. and Kang, S H., 1998 "Corporate Governance, Expected Operating Performance, and Pricing" SSRN Working Paper
- 26 Gedajlovic, E. R. and Shapiro, D. M., 1998 "Management and Ownership Effects: Evidence from Five Countr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19, pp. 533 - 553
- 27 Gomes, A. and Novaes, W., 1999 "Multiple Large Shareholder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Working Paper, The Wharton Schoo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28 Hill, C. W. and Snell, S. A., 1989 "Effects of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Control on Corporate Productiv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 32, pp. 25 - 46
- 29 Holdemess, C. G. and Sheehan, D., 1988 "The Role of Majority Shareholders in Publicly Held Corporation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 20, pp. 317 - 346.
- 30 Johnson, S.; 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and Shleifer, A., 2000 "Tunnel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 90, pp. 22 - 27.
- 31 Kodde, D. and Palm, F., 1986 "Wald Criteria for Jointly Testing Equality and Inequality Restrictions" Econometrica, Vol 54, pp. 1243 - 1248
- 32 Levy, J., 1983 "The Effect of Shareholding Dispersion on the Degree of Controls" Economic Journal, Vol 93, pp. 351 - 369.
- 33 Sarkar, J. and Sarkar, S., 2000 "Large Shareholder Activism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Indi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e, Vol 1(3), pp. 161 - 194

(责任编辑:彭爽)